

新文學史料

語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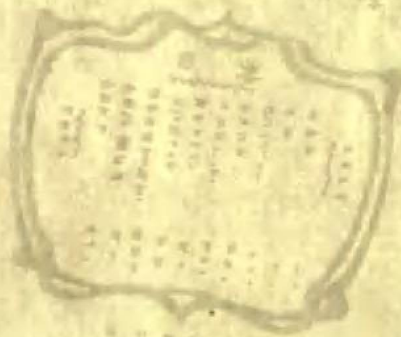
新青年

太陽月刊

一月號

LA JEUNESSE

青年生活



文

第一卷

小說月報

創造季刊

3

6

新文学史料

第三辑目录

〔一九七九年五月〕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 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李大钊……………贾 芝 1
——《李大钊诗文选集》重版后记
-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 9
- 五四前后的北大……………蔡元培 15
- 五四运动述感之二……………郭绍虞 17
- 有关五四的一点回忆……………赵景深 18
- 五四运动纪实……………匡互生 20
- 回忆五四……………沈尹默 31
- 兔进文艺的新潮……………郭沫若 33
- 新文化运动在四川……………孟 默 36
- 《初期白话诗稿》序……………刘半农 40
附：《初期白话诗稿》目录
- 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郑振铎 44
- 五四运动的今昔……………张申府 46
——有关五四运动的零感散忆之一
- “文白之争”温故录……………舒 芜 48

回 忆 录

- 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茅 盾 63
——回忆录(三)
- 来今雨轩……………钦 文 76
- 想天涯，思海角……………陈学昭 83
——回忆录(二)
- 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秉 雄、三 强、德 充 105
- 忆沉君……………陆佩如 113
——沉痛悼念冯沉君同志逝世四周年
- 缅怀冯沉君师……………袁世硕 117
——写于汇编先生的论文集之后
- 回忆统照先生……………王西彦 122
- 忆赵树理同志……………康 濯 131
- 忆谷柳……………夏 衍 138
——重印《虾球传》代序
- 回忆谷柳……………钟敬文 140
- 回忆郑振铎同志……………廖静文 144
- 忆梦家……………赵萝蕤 148
- 敌后抢救……………黄秋耘 153

书 刊 杂 忆

- 《晨报诗刊》的始终……………蹇先艾 157
- 《泡沫》碎屑、《浪花》点滴……………碧 野 159
- “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林 林 161
——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
- 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变迁……………高君晟 165
-

《海天》的天地在哪里? 凤 子 168
——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断之一

《人世间》的前前后后 凤 子 169
——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断之二

编辑忆旧 赵家璧 172

传记·年表

闻一多传(三) 王 康 176

李长之年表 李 书 189

访问记

走访茅盾 苏珊娜·贝尔纳 191

鲁迅研究

鲁迅与钱玄尚 姜德明 198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 胡从经 216
——纪念《支那小说史》出版四十五周年

作家与作品

《雕虫纪历(1930—1958)》自序 卞之琳 221

老舍之歌 黄苗子 232
——老舍的生平和创作

日记·书简

战地日记选 黄谷柳 247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二) 萧 军 259

考 证

《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 马蹄疾 275

文学社团

文学研究会(资料) 仲 源 编 282

轶闻轶事

蔡元培“引咎辞职” 蔡 杨 16
鲁迅先生轶事 蔡元培 147
海外东坡 郑尔康 190
汝龙的创作小说 穆 村 280
“诗人节”的由来 常 久 39

补 白

丁玲谈《莎菲女士的日记》 蔡恒茂 45
新诗和旧诗 柳亚子 43
蔡元培挽鲁迅联 枕 书 35
郁达夫挽郁华联 枕 书 47

来信摘登

关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乔松 陈瑜清 293) 关于《郁达夫著作编目》(朱金顺 刘锡庆 吴泰昌 唐鸿棣 293) 关于《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欧阳山尊 王余杞 295) 关于《申报〈自由谈〉源流》(锡 金 296) 关于《柳亚子与鲁迅》(陈福康 297) 关于《第一次文代会日记》(钱理 钱小惠 钱厚祥 297) 关于东京演出的《雷雨》(凤子 297) 关于错字(周汉生 缪世荣 赵铭彝 297) 作者更正(陈学昭 钦文 104)

悼 念

崔嵬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298
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 299
李长之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 299

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诗文选集》重版后记

贾 芝

一九五九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稿，编选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著称，并且勇敢地领导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斗争。他在长时期的革命活动中，留下了不朽的论述和诗篇。把这些著作从文学的角度编一个选集，对于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诞生，对于了解中国革命或向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学习，都是有意义的。

关于李大钊同志早年的写作情况，《言治杂志》的主编郁嶷先生在《送李守常留学日本序》中有一段记载：

余与君虽聚从六载，而相与为文字交，则自今春始。盖往者日敝心力于校课，无暇及是；属毕业伊尔，同人组织北洋法政学会成，金议创《言治月刊》，抒发蕴蓄，且征进德。君翩然起众人中，偕余朝暮经画。首期出版，海内日报杂志，转录迨遍，尤以君文为最。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作，而君则振翰萃萃，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扬先哲貽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

这是李大钊同志在读书时代开始发表写作时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说他的文章当时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造意树义，首先以民生为念，“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郁嶷先生又说李大钊同志那时的文章，是“伤世痛俗之辞，绵绵汨汨”，“箴贬贲蒙，鼓舞群伦”。这虽然讲的是李大钊同志早年写作的情况，但我们看到，在他以后的诗文里，也一直有着“箴贬贲蒙，鼓舞群伦”的特点。而且，由于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解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所以他的文章也一直表现了“感慨悲歌”的文风。

十月革命以后，他找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正确道路。他在大学的讲台上宣传唯物史

观，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历史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文章。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也解放了文体，用白话写作，并且写了新鲜活泼的白话诗和很多富于战斗性的杂感。从建党直到牺牲，他的论著偏重于研究当时中国革命问题，阐释社会主义和党的政策，也有一些学术性的著作。无论是诗歌、散文、杂感或论文，都是他在革命活动中出于战斗的需要而写作的，因而成为革命历史的丰碑，这是他的著述和一般诗人、作家不尽相同的地方。

一九五九年，从报刊杂志搜集的李大钊同志的遗作，总计三百五十余篇，其中有的还只有题目而没有原文。这次修订选集时，我重新统计了一下，迄今所发现的他的遗作，共计四百三十余篇。这当然还是一个不完整的数字，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搜集。

李大钊同志用过的笔名，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有：李钊、守常、李大钊、李守常、孤松、剑影、明明、冥冥、常、钊、T.C.、S.C.生、L.S.C.生、L.C.C.生、猎夫、琴华等等。

李大钊同志留下来的手稿、墨迹极少，也没有留下一篇日记。书信（包括报刊上发表的和原信）已发现的一共也只有十几封。这些情况显然与其他诗人、作家或革命家也大不相同。这是由于他本人的革命生涯和在他牺牲以后所遇到的动乱年代造成的。首先是北洋军阀反动政府逮捕他的时候，他被抄了家，他的藏书、手稿及衣物，劫掠一空。河北乐亭故乡曾存有一木柜他年轻时代的文稿及家书，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的搜查、封门的恐怖中也被烧掉了。抗战以前，星华在北京还保存了她父亲的一本旧体诗稿、一首长诗、一封从昌黎五峰山寄出的家书，以及一九三三年出殡时的一些照片、挽联，还有一本用麻纸订的亲友捐款登记簿（上面有鲁迅捐款五十元，与鲁迅日记一致）等等，她在临去延安时寄存在友人家里，解放后也都再也找不到了，只找回抗战以前我们自己买的一本故宫影印的《岳麓寺碑》和一本刘半农编的影印《初期白话诗稿》，其中收有李大钊同志的一首白话诗《山中即景》的墨迹。选集卷首的插页背面上的《山中即景》手迹，就是根据这本《初期白话诗稿》复制的。遗失了的那本诗稿，我记得是一般学生作文用的红格稿纸，这部诗稿以及出殡捐款登记簿、照片、挽联等等所遇到的命运，仍然是在北平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的时期被焚毁。

一九六五年发现了李大钊同志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原稿，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俄罗斯文学与革命》。这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他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原稿。它是从胡适的藏书里被发现的。在胡适的档案里，还发现了这篇文章的一个誉清稿，用的是印有“新青年原稿用纸”字样的十六开绿格竹纸，是用毛笔抄写的。看来是《新青年》编辑部的人抄的，准备发表这篇文章而结果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介绍俄国诗人们站在社会革命运动的斗争前列的光辉事迹，颂扬他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

神。文末说：

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放，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俄罗斯青年乎！其何以慰此血迹淋淋、颜色惨淡之诗神？其何以报彼为社会牺牲之诗人？

“今也赤旗飘扬”几个字，大概就会把胡适吓得面无人色，七窍出火，只能把它贬为“抽屜文学”了。这次修订选集时，收入了这篇不曾发表过的文章。

李大钊同志从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到最后为革命牺牲，在大约只有十七个年头的的时间里，写了那么多的诗文专著，他的勤奋努力，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而极力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竟要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李大钊同志也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还定调子说，“李大钊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老奸巨滑的人的唆使下，狂犬吠日，甚至要把他诬蔑为“叛徒”。说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冠以“激进的”三个字，很有一点欺骗作用；而加上这个形容词，他终于还是逃不了是一个“民主派”——“民主派”的别名就是“走资派”。“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甚至要把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第一个走上敌人的绞刑架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也要打成“民主派”和“叛徒”。然而，他们越是这般猖狂，越是用极“左”的手法搞反革命的阴谋，恰恰就更加暴露了他们是一伙人民的敌人。读者请看看一九七五年七月以“上海复旦大学”名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以下简称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全身像

“党史”）这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就可以了解“四人帮”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是如何地任意篡改历史了。在这本反革命“杰作”里，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春秋笔法及“换头术”之类，不一而足。它把“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卑劣手法和卑鄙面目暴露无遗。在这本“党史”里，李大钊同志的历史不见了，只字不提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抹杀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甚至连早已是历史常识的东西也一笔勾销了。在这个“党史”里，李大钊同志被极力加以歪曲。与此相反，叛徒江青却不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而且被大吹特吹为社会主义时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的“文艺革命旗手”。这部“党史”可算得是“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影射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卑鄙、最拙劣的杰作了。

比如，谁都知道李大钊同志在建党以前就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著名，而且在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代表无产阶级一方。李大钊同志从昌黎五峰山寄出一封给胡适的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驳斥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谬论，旗帜鲜明地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可是“党史”中对这场论战是这样写的：

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九一九年五月，胡适约请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来“讲学”。七月，他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这种宣传标志着旧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但是胡适却把他的黑货冒充“新文化”用来欺骗群众。

我在这里完整地、一字不差地抄了这段话，请读者看看。“党史”的伪造者指出，胡适是提倡杜威的改良主义的，说他发起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又说胡适发表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可是谁是胡适的挑战的回答者和驳斥者呢？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又是谁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呢？在这里，代表无产阶级一方的“李大钊”不见了，被一笔勾销，故意抹杀了。难道一场论战，只讲资产阶级一方，不提无产阶级一方，就能标志出新文化运动的“分化”吗？在这种描绘中，一场重要的论战化为乌有，似乎它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四人帮”一刀砍掉了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一方，而且竟还把历史上有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旧的新文化运动”。这难道不比胡适用他的“黑货”欺骗群众更胜一筹，也更为拙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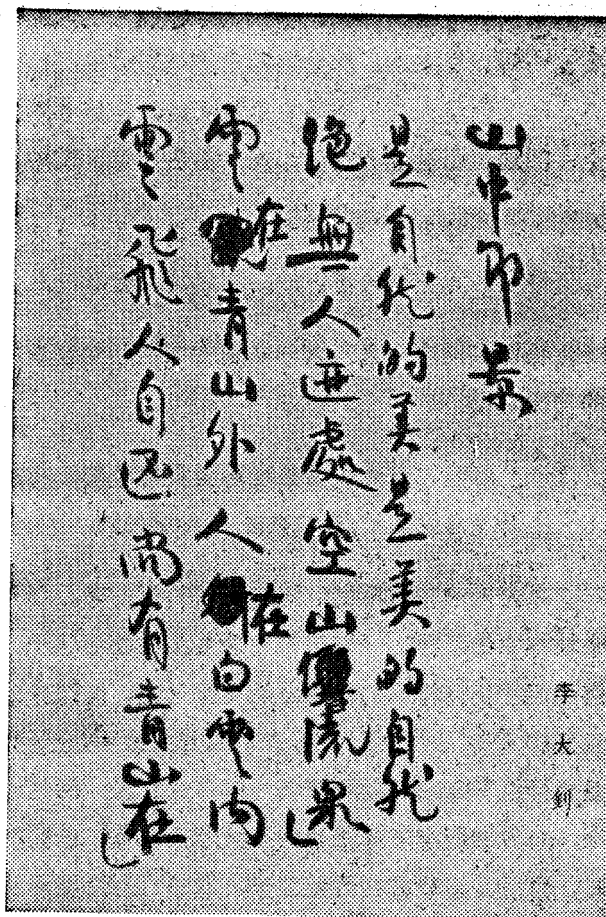
又如，谁都知道李大钊同志忠诚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曾经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在形成北伐大革命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次国共合作中，他是党的首席代表，有一张很流行的李大钊同志与孙中山先生步出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

次代表大会会场的照片，可以说明当时的历史情况。此后，他负责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方领导国共两党的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这本“党史”中，连李大钊同志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字也被勾掉了。“四人帮”竟又一刀砍掉了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一方的首席代表。他们显然是有意要把李大钊同志从历史中抹掉。

仅仅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四人帮”是怎样为篡党夺权蓄意篡改和伪造历史了。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这样愚蠢地否定历史常识，就象他们曾经把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篡改为林彪和毛主席会师一样的荒唐可笑。但这种伪造历史的伎俩，并不能使“四人帮”得到好处，而只能使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无法掩饰地败露在人们面前。他们的骗术，也不能可不是短命的。

李大钊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驳斥“四人帮”的这种诬蔑的最好论证，就是李大钊同志本人的历史和他的遗著。这个诗文集也足以揭穿“四人帮”的谎言。这里特别选了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再论问题与主义》，另一篇是这次修订中增选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此外，当然还有其它的有关重要文章，比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因为文章长，专门性大，这个集子里就不选了。前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后一篇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李大钊同志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的演讲记录。李大钊同志在这篇演讲中向青年们通俗易懂地说明马克思是怎样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而且他指出，中国的劳动者比各国无产阶级受资本家的压迫还要厉害。又说：“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知道，革命乃是



李大钊作的白话诗《山中即景》墨迹

我们更大的前途。”“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李大钊同志是在代表哪个阶级说话，他为什么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难道这不是十分明白的吗？

李大钊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不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研究，他不止一次地声明过他的这种心境，他在这篇讲演中还说：

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的学说的，真正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时说：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斯诺：《西行漫记》）

毛主席的亲切回忆，对“四人帮”诬蔑李大钊同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最有力的驳斥。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目空一切，硬把自己吹成是“天马行空”，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者”、“旗手”，张春桥及其同伙不是把他的谬论吹成是什么“张春桥思想”，而且是什么“第四个里程碑”吗？何等地荒唐！何等地无耻！

李大钊同志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牺牲了半个世纪。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也就是在他被捕的第三天，北平《晨报》报导他在敌人法庭上的态度时说：

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对北方有密谋。

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

同一天《世界日报》也有报导证实李大钊的被捕，并说到他受审讯时的情况：

李着灰长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这些报导一致描述了李大钊同志一贯崇信真理的权威和他在反动派的迫害下无所畏惧的坚定态度。

他在狱中的自述中，历历叙述了他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立志从事革命的抱负。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的供词中没有半句损伤党的荣誉的言词；他大讲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

国家，以求民族的独立与自主，曾与孙中山先生交往，参与国民党活动，并且声明一切由他负责，希望不要株连其他爱国青年；对于有关党的秘密，只字未提。他的身体，因备受酷刑而遭到严重摧残，但敌人的审讯丝毫也没有能够使他屈服。反动报纸说他“迷信共产，遭受极刑”，“识者无不为之惋惜”，而这恰恰说明了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贞不屈。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来营救他，他坚决拒绝。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耗费革命力量。现在，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再受损失。”^①当时报纸上还报导，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口不谈家事”。

李大钊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丝毫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一心为革命，临危不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四人帮”及其爪牙，企图把他在狱中的供词找来做文章，想从里面找出“叛徒”的证据来，只能是枉费心机而已。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反动政府与北伐中途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华公使团三方的阴谋勾结下，判处了李大钊同志“绞刑”。在血腥的“四·一二”事变之后只有一个星期，南北议和，一时甚嚣尘上，北洋军阀政府极端仇恨就在它身边燃烧的革命火种，于是由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与司法部门急急忙忙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对李大钊同志和他的战友们进行了所谓“军法会审”。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上午十时在京师警察所开庭审判，当天下午就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后院，用从西方进口的、中国从来也没有的绞架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和与他同时横罹惨祸的十九位青年战友。李大钊同志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他面对反动军警作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杀死了我，就杀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

和他同时牺牲的十九位烈士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左派。他们是：谭祖尧，邓文辉，路友于、张栢兰（女）、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莫华、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

李大钊同志说过：“自由之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②他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浇灌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自由之花，他献身于人民革命事业，流尽了自己的鲜血。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的灵柩在宣武门外的浙寺里停放了六年，无法安葬。一九三三年，在党的安排下，经过北京大学朋友们的帮助，将他葬在西山万安公墓。出殡时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和公祭。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打散了游行队伍，捣毁了祭

^① 见《李大钊抗日史略》（1949年8月苏南新华书店《烈士传》）。

^② 1920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坛，许多革命青年遭到逮捕。

万安公墓当时也并不乐意接受象他这样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公墓的老板、资本家蒋某，起先以李大钊同志“死于非命”为由，拒绝卖给一块墓地；后来经过几次交涉，勉强同意了，但只能把他葬在公墓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理由仍然是“死于非命”，所以不能卖给“正穴”。

在出殡时，党组织给李大钊同志送来一块石碑。碑上刻有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和碑文。当游行队伍被打散，和尚道士都跑了之后，一辆上面用旧棉袄和花圈覆盖着石碑的大车，加入到继续前进的灵柩和家属坐的马车的行列，到了万安公墓。因为在蒋介石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的石碑是不能在墓地公开竖立的，他的朋友们遂临时出主意将这块石碑作为墓志铭埋在他的墓中。这块当年被视为最危险的刻有镰刀斧头的石碑，至今还掩埋在野草丛生的墓地下面，是前去扫墓凭吊的人们所看不到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也曾受同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说：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对死者寄予同情而对于反动军阀统治表示义愤的碑文，在风凄雨横的一九三三年也绝不能被允许公开发表。所以刘半农先生虽然起草了这篇碑文，也没有能够用。于是只刻了一块由刘半农先生书写的仅有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墓碑，竖立在李大钊同志的墓前。

读者如果要了解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在理论上和革命活动上的全部贡献，除了这部诗文选集，还需要阅读他论述中国革命的一些方面（如农民问题、妇女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对俄国革命的介绍、评价孙中山等等）的重要文章。这个集子偏重于从文学的角度编选，同时注意满足一般读者了解他的要求。要从李大钊同志的遗作中比较全面地了解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他的革命精神和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高贵品质，我想这样一个选本对读者是有益的。

目前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期。今年欣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震撼世界的四五运动；在今天这样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将《李大钊诗文选集》献给广大青年读者，这绝不止是一个颇为珍贵的纪念，还希望它能够鼓舞群众斗志，以建设一个向着共产主义理想前进的美好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

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

我是一九一八年暑假的时候，跟毛主席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一路共二十多人，从湖南来到北京的。

这年九月，我进北大预科德文班学习。当时的北大校长系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虽是前清的翰林出身，但却是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曾两次到欧洲留学，在国内很有声望，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当时认为大学的教育是个根本问题。因此，他到北京大学以后，就力图把北大从旧式的学校办成一所新式的学校，他主张兼容并包，聘请各方面的有名望的人物来当教授，然而，在这些人中，还是以一些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为主，如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李大钊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请来当教授。蔡先生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对于在北大形成一种活跃的学术空气，把一些进步的学者云集北大，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力量，无疑是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的。

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社会状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动荡的社会局势反映在北京大学，便是激烈的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这种斗争随着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政治变动和外交吃紧，也就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活跃。它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这些社团在当时还主要是学术性质的团体，其中哲学、新闻、进德三个学会，是以学校名义组织、由蔡元培先生领导的。除了这种“官方”的以外，在当时也有一些“私人”的团体，较重要的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辅仁社（简称：辅社）等等。

毛主席曾积极参加了当时北大的一些学会的活动。李大钊先生和其他一些进步教授也经常参加一些学会的活动。

杨怀中先生参加了哲学会，可以说他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

当时陈独秀任文学院院长，主办《新青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写了很多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入学以后，也参加过学校一般的学术活动，这些学术上的活动与后来的五四运动有间接关系，而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上述种种学会的组织及其活跃的学术活动，对于原是封建

礼教、孔孟思想等等的集中地——落后的北大说来，不能不就是一种冲击，是一种革新。

上述种种学会的负责人，在当年都是比较开明、进步的。这些学会中的不少成员，后来参加了党或团的组织。

哲学会的领导人是蔡元培先生自己。蔡先生刚到北大时，还组织过进德会，提倡不做官、不纳妾、不赌不嫖，想把北大腐败的风气革掉。为了提倡新生活，一个进步职员李辛白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生活周刊》（按：这个刊物是在五四后出版的）。

新闻学会的领导人是邵振青，又名邵飘萍，浙江东阳人。邵为了宣传赤化，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被奉系军阀枪杀了。他是北方新闻界最早和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新闻学会有会员五十余人，毛主席、谭平山（大革命失败后脱党）、陈公博（很早即脱党，成为汪精卫派的骨干，抗日战争时当了大汉奸）、高尚德和我都曾参加过这个组织，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员，从这也说明新闻学会的作用。

辅社是以湖南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为基础、和新民学会同时存在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有一些政治思想的表现，即爱国主义。我在湖南加入了辅社，是负责人之一，我同时又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一九一八年暑假，我跟毛主席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到北京以后，辅社便以湖南人为基础，吸收了一些外省籍的同学参加，把活动的中心放在北大。辅社没有公开。

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周长宪，北大法律系的学生。周也是《国民》的主编人之一，曾写过几篇文章。当时，北京国立八校都有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在北大，其会员尤为众多。邓中夏、张国焘（以后叛变革命，被开除出党）、黄日葵、许德珩等人都曾参加过这一组织。在五四运动中，国民杂志社曾起过一些进步的作用。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不少人还加入了平民教育讲演团。

国民杂志社在当时可分为三种思想派别：一是较保守的，二是较激进的，三是居于两者之间较中和的。参加五四运动的是后两种思想派别的人。这三派的人我现在只找到了十几个人的名单。

在五四前夕，除上述种种社团的组织外，还有各班各系各院的学生会组织。班有班会，系有系学生会，院有院学生会，但从整个北大说来，还没有正式的全校的学生会。在院一级的学生会中，仅文学院、理学院的学生会组织情况比较整齐、比较坚强，而其他则不十分严密。除北大之外，国立八校如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农科等都有一系列的学生组织，此外，还有同乡会等等。有些同乡会在政治活动中是很有力量的。这些学生会、同乡会，及社团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如：弥耕（李梅耕）、纵宇（罗章龙）、无坚、贻甫（易克嶷）、海潮（罗汉）、互孙（匡互生）、隐沦（张隐沦）、树荣（张树荣）、德荣（陈德荣）、天放（宋天放）、雨溟（吴汝铭）、澄宇（刘

澄宇)、百英(缪伯英,女)等人在五四运动中都是比较活跃的。

在关于记述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中提到,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客士主义研究会),该书并附有年表,我认为它的话是有根据的。

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组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种组织力量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

六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成功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认识到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过去,走俄国人的道路——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手段,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国家,这就是结论,因之在五四游行中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暴力行动的发生也是不难理解的。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中,还认识了一条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旧思想和反帝反军阀的万丈光芒中,还闪耀出一道灿烂的红光普照神州大地,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为一九二〇年三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以及上海、北京、长沙、汉口、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思(按:马克思当时或译为“马克斯”、“马克司”,均照原文未加以改动)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为了公开招收会员,启事上还登有通讯处,第一院是王有德,西斋是我。在这个启事中,还登了发起人的十九人名单。这十九个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我把他们的情况简单地介绍如下:

高崇焕:河北人,北大法学院法律系学生。

王有德:云南人,德文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

邓中夏:湖南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

罗章龙:文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

吴汝铭:湖南人,法学院学生,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后为共产党员。

黄绍谷:湖南人,文学院学生,共青团员(以后参加国民党)。

王复生:云南人,法学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

黄日葵：广西人，中文系学生，共产党员。

李 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后为共产党员。

杨人杞：湖南人，文学系学生。

李梅羹：湖南浏阳人，德文班学生，共产党员。

吴容沧：浙江人，中文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

刘仁静：物理系学生，共产党员(后变为托派)。

范鸿劫：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共产党员。

宋天放：文学院学生，后为共产党员。

高尚德：山西人，英文系学生，共产党员。

何孟雄：湖南人，共产党员。

朱务善：法学院学生，共产党员。

范齐韩：法学院学生。

至此，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公开化了。

当然，这个公开化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记得有一次，上述十九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会，大家谈来谈去，不少人想把组织公开出去，但也有人反对，认为若公开出去问题不少，然而最后还是决定：在北大校刊上登一个启事，把牌子打出去。启事是由我写的，写好以后，由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我向蔡先生宣传一番我们为什么要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先生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给予刊登了。由于蔡先生左右有不少顽固保守的人，因此，我们找蔡先生要求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左右的人知道。待到《北京大学日刊》把启事登出来后，这些人便对蔡先生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尔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拟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又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时还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开完成立大会后，还拍了一张照片。这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算公开成立了。成立以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当时办这些事也不是顺利的，因为蔡先生左右的顽固保守分子反对我们，公开同我们作对，不肯拨房子给我们，认为此举将使学校不得太平，对此蔡先生便对那些顽固保守分子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在当时支持进步的学生确是很有见识和勇气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和图书室，我们便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室)。在“康慕尼斋”的中间墙上贴有一副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这副对联是大家凑的。五四时期总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对联中的“出实验室”，